

中國駐日代表團之研究 —初探戰後中日・臺日關係之二元架構

楊子震

摘 要

戰後初期的中日關係，實質上與臺日關係呈現相互重疊的面貌；而戰後初期臺灣的「去殖民地化」過程，深受國民政府的終戰處理與其對日本的戰後政略所影響。國府對於日本的戰後處理，著重於日本的非軍事化、民主化以及賠償問題的處理。其目的除了在於抑制日本軍國主義再起的可能性外，主要還是著眼於利用日本的賠償充實國力，強化戰後重新取得大國地位。

駐日代表團的存在，其意義在於中國作為四強之一，參與了同盟國對於日本所實施的占領與管理之運作，象徵著中國的新國際地位。駐日代表團團長以中國代表的資格，參加對日理事會。駐日代表團在性質上，係具有外交機能的軍事代表團，與盟總交涉協調，包括保護華僑、情報蒐集、物料價購等事務。而駐日代表團最為重視，投入最多人力、物力與精神的業務，則是賠償物資的調查與接收，這實際上反映了國府對日本之戰後構想的真正主軸所在。

澀谷事件除凸顯出戰後過渡時期的臺灣人國籍變更問題以外，亦反映出駐日代表團與在日華僑、在日臺灣人間互動的隔閡。部分駐日代表團團員儘管對某些在日臺灣人的作為不表認同，卻不得不對其華僑身分加以維護與爭取。

事實上，國府新獲得的國際地位與中國的實際國力並不相稱，當美國的對日政策受到國共內戰日益加劇等因素影響，由壓抑預防日本軍國主義再起，轉變成積極協助日本的經濟復興時，國府的對日索賠之構想與期待便不免受到挫折。後期駐日代表團的內紛與不振，即與中國內部的混亂與其國際威信的低落相關。

關鍵詞：駐日代表團、國民政府、戰後構想、去殖民地化、澀谷事件。

A Study of the Chinese Mission in Japan: The binary struc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a- Japan and Taiwan-Japan in the Postwar Period

Tzu-chen Ya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a-Japan was overlapped with that of Taiwan-Japan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he process of postwar decolonization of Taiwan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 Japa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dealing with Japan focused on demilitar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reparations settlement with the purposes of refraining Japanese militarism's revival, taking the reparations for reinforcing her national power and finally sustaining a great power's status.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Mission represented China's new international status with its taking part in occupying Japan as a victorious Allied member. The head of the Chinese Mission joined the Allied Council for Japan as a state representative. In essence, the Chinese Mission was a military delegation with a diplomatic function. The main assignment of the Chinese Mission lied in negotiating with the GHQ, protection of ethnic Chinese,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purchase of materials. But in fact, the Chinese Mission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taking over the Japanese reparations. This reflected the real intentio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ward Japan in postwar.

The Shibuya Incident not only exposed the problem of the change of Taiwanese nationality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ut also reflected the gaps between the Chinese Mission and Taiwanese residents in Japan. Although som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Mission didn't agree to a few Taiwanese' behavior, they could not but try hard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as Chinese citizens.

^{*} Doctoral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sukuba.

Actually, the newly acquired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id not correspond with its actual strength. As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policy changed from refraining Japan's militarism to help its economical recovery due to the deteriorating situation of the civil war in China, the hope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getting the reparations from Japan were frustrated. The internal disputes and low morale in the Chinese Mission just reflected China's chaos and decreas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Keywords: Chinese Mission, Nationalist government, Japan, decolonization, the Shibuya Incident.

中國駐日代表團之研究 —初探戰後中日・臺日關係之二元架構*

楊子震**

壹、前言

關於戰後臺灣外交的出發點何在，日本的中國外交史學者川島真認為，實際上即為中華民國的對日戰後處理外交。¹其亦指出戰後的中日關係延續了大陸時期國民政府與戰前日本的關係，而1945年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結束以後，盟軍占領下的日本與被中華民國接收的臺灣之間，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經濟與文化的聯繫。1949年12月於國共內戰中失利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²播遷至臺灣後，中華民國與日本的關係，在實質上與臺灣和日本間的相互往來呈現相互重疊的面貌。此種戰後中日・臺日關係的二重性，一方面左右了日本「去帝國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亦對臺灣的「去殖民地化」過程帶來影響。³因此，若欲探究戰後初期臺灣的「去殖民地化」過程，戰後初期國府的對日構想與政策作為亦需有所留意。

再者，近年來部分日本的年輕學者在對1940年代的國府進行研究時，發現國府在大陸時期的行政、法制及其施政經驗，對其日後在臺灣的統治有所影響，有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8年4月1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年12月24日。

** 日本筑波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生

- 1 川島真，〈戰後臺灣外交の出發點—中華民國としての對日戰後處理外交〉，《北大法學論集》，第51卷第4號（2000年11月），頁1490-1503。
- 2 考量歷史敘述的連續性，本稿對訓政時期的「國民政府」與憲政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兩者皆以「國府」簡稱之。
- 3 川島真，〈日華・日臺二重關係の形成—1945-51年—〉，川島真、松田康博編，《日臺關係：1945-2005》（東京：東大出版會，近刊預定），頁13-37。

著繼承與斷絕的關係，而此種繼承與斷絕的關係，亦影響到日後臺灣的民主化等歷程。⁴何義麟曾於評論駒込武所著之《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時提醒臺灣學界：「日治時期的臺灣史研究原本就與日本近代史研究有重疊之部分，若未能吸收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將會失去最重要的對話夥伴」。⁵考量到日本曾為臺灣的舊宗主國，以及中華民國的戰前戰後之連續性，進行臺灣史研究時，由日本史與中國史出發的關懷是有其必要的。⁶由此看來，如何吸收盟國占領日本時期與戰後初期中華民國的同時代史研究成果，亦為戰後初期臺灣史研究的課題之一。

秉持上述學界近來的潮流與觀點，檢討盟國占領日本時期史與戰後初期中華民國史的相關研究後可以發現，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迄中日和平條約簽訂為止之間的中日・臺日關係（1945-1952年），其先行研究主要集中於戰爭賠償問題⁷與中日和平條約締結⁸等議題上。前述兩研究議題以外，澀谷事件⁹與臺日通商問題¹⁰近

-
- 4 例如：山本真，〈中華民國史と臺灣史との接点をめぐって—大陸と臺灣での農地改革と土地行政〉，《アジア遊學》，48（2003年2月），頁118-224。中村元哉，〈1940年代政治史からみた『自由中國』創刊の背景—『出版法』改正議論をめぐって〉，《現代臺灣研究》，第29號（2005年12月），頁21-35。
 - 5 何義麟，〈評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新史學》，第11卷4期（2002年12月），頁131。
 - 6 川島真，〈日華外交史・日臺關係史研究動向—フォーラム参加の記録〉，《公共政策を讀む》，第1集（2006年3月），頁45-53。
 - 7 關於戰爭賠償問題，在臺灣方面，經遲景德、孟祥瀚等投入，已累積相當的研究成果。最新的研究成果為吳淑鳳，〈戰後中國對日求償之交渉（1945-1949）〉，《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13期（2008年9月），頁267-293。日本方面較為代表性的著作有殷燕軍，《中日戰爭賠償問題》（東京：御茶水書房，1996年10月）。
 - 8 關於中日和平條約，臺灣方面最近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黃自進，〈戰後臺灣主權爭議與《中日和平和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4期（2006年12月），頁59-104。日本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袁克勤，《アメリカと日華講和》（東京：柏書房，2001年3月）。
 - 9 關於澀谷事件問題，儘管尚有進一步研究空間的可能，但經過郭譽孚、許育銘等研究，業已有較為清楚的輪廓。最近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二：湯熙勇，〈公平對待與秩序維持之間：日本東京澀谷事件與臺灣人的審判（1946-47）〉，《亞太研究論壇》，第35期（2007年3月），頁1-35；何義麟，〈戰後臺灣における海外ニュースの報道と規制—澀谷事件の報道を中心に—〉，《現代臺灣研究》，第32號（2007年9月），頁3-19。
 - 10 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年）》（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10月）。

來亦開始受到注目。惟國府對日本的戰後政策的相關研究成果仍有待累積，¹¹可說尚處於草創期，有進一步透過檔案史料的發掘，加以積極開拓的必要。¹²

以中國駐日代表團（Chinese Mission，1946-1952年，以下簡稱「駐日代表團」）為例，澀谷事件發生後臺灣社會的反應與日本政府的對應，經湯熙勇、許育銘、何義麟等人的研究，目前已有較為清楚的認識。但是在國府方面的對應，特別是有關駐日代表團的專門研究，相對之下實屬缺乏。¹³

除了先行研究尚有待累積以外，事實上，提及有關駐日代表團的回憶錄或口述歷史亦不多見。為數不多的資料中，提及駐日代表團時，亦多半是負面的評價。如副總統陳誠便曾回憶：「抗戰勝利後，我們派遣到日本去的中國代表團，對內分別門戶、爭權奪利，對外招搖撞騙、假公濟私，簡直不成體統到了極點，以致引起各方面的輕視與憎惡。日本人暗地裏不說這是中國代表團，而戲謔之為『代表中國團』，這還不算丟盡了整個國家的臉嗎？」¹⁴曾任臺北市市長的高玉樹，亦曾批評駐日代表團：「代表團頂著戰勝國的光環，穿得漂漂亮亮，專做表面功夫，專講官話，鬧緋聞，做起事來，卻敷衍塞責，甚至上下其手，貪污腐化。他們雖然也派有兩個人辦僑務，但錢是不會供給窮苦的人的，對臺僑沒有什麼幫助。」¹⁵自稱澀谷事件當事者的林歲德，則直指駐日代表團軟弱、無能。¹⁶可說是無論官方或民

11 日本方面較早以鳥瞰的角度探討國府戰後初期對日政策的有石井明，〈中國の對日占領政策〉，《國際政治（日本占領の多角的研究）》，第85號（1987年5月），頁25-40。

12 張啟雄，〈占領期中華民國的對日政策（1945-52）〉，口頭報告發表於早稻田大學「戰後的臺灣與日本學術研討會」，（2007年10月29日）。

13 嘗試利用《國軍檔案》，藉由對駐日憲兵隊的研究勾畫出國府初期之對日政策，有黃文德，〈中華民國對日派遣占領軍之問題—以駐日憲兵隊為討論中心〉，《憲兵半月刊》，第63期（2006年9月），頁114-128。惟其就駐日代表團並未著墨太多。

14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2005年7月），頁123。

15 高玉樹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年7月），頁29。

16 林歲德，〈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下の臺灣に生きて（中）—戰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と在日華僑の苦難〉，《日中》，第4卷第1號（1973年12月），頁53-64。

間，儘管立場不一，對駐日代表團的評價卻都相當接近。

可是，換一個角度，就目前可掌握的代表團成員之出身背景資料來加以審視，卻又難以與所謂腐敗無能集團的印象相聯繫。¹⁷再者，成立於1946年，而於1952年裁撤的駐日代表團，實係國府於戰後過渡時期對日政策的實際執行與辦理交涉單位。若考慮此點，實有針對駐日代表團所扮演的角色與其發揮的功能作一更深入檢討的必要。

本文主要利用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外交部檔案》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佐以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國軍檔案》、外交部寄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部檔案》中有關駐日代表團的文書電稿，並參酌駐日代表團團員與旅日臺灣人的回憶錄，¹⁸整理並建構駐日代表團由成立到結束的沿革與組織，就其實際活動探討其主要任務與工作成果為何，並嘗試以澀谷事件為例，檢討其所處的立場與遂行任務上所面臨之困境。希望透過對駐日代表團的考察，來勾勒出二戰後中日關係與臺日關係之二元架構的開端。因囿於史料，本文1949年以後相關內容較為不足。¹⁹惟駐日代表團的業務職掌與所進行的工

17 首任團長朱世明（1902-1965），陸軍中將，曾留學美國，先後就學於麻省理工學院、維吉尼亞軍校，二戰中曾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駐美大使館武官。第二組組長吳文藻（1901-1985），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曾任燕京大學社會系教授、國府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中國社會學學者費孝通為其學生。第三組組長吳半農（1905-1978），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曾任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資源委員會駐美技術委員會專門委員。此外，撰寫《萬曆十五年》的明史學者黃仁宇（1918-2000），曾於1949-1950年任職於代表團，擔任團長副官。以上參閱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上冊（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頁336、590、595-596。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1月），頁152-171。荻野脩二，〈謝冰心的一面—したたかさ—〉，《中國文學會紀要》，第27號（2006年3月），頁3。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上冊（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12月），頁618。

18 本稿撰寫時曾參酌以下人士回憶錄：沈觀鼎、鍾漢波、黃仁宇、石家孝（以上為代表團團員）；高玉樹、林歲德（以上為在日臺灣人）。惟回憶錄當中亦有內容前後出入，記述明顯矛盾錯誤者，故並非全數引用。

1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亦保管有國府戰後初期對日政策與活動的相關資料，惟筆者2007年4月底5月初造訪時，國府外交部相關檔案並未對外公開。再者，寄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部亞太司檔案》，因數位化掃描作業尚在進行，部分與駐日代表團相關的檔案尚未能予以閱讀（2009年1月確認）。1949年以後至1952年裁撤為止的駐日代表團，其組織架構、業務職掌與前期相似，惟其實際的工作細節，尚待日後配合史料公開狀況加以檢討。

作，或因中國內部政局的變化而有所停滯或挫折，但並未因此而中斷，仍有其連續性。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成立，駐日代表團仍為中華民國外交部所節制，並未因國共內戰的歸趨而有所不同。

貳、國民政府的戰後初期對日政策

由於駐日代表團係國府對日政策的實際執行與辦理交涉單位，故欲探討駐日代表團在日本所進行的活動，就有必要對國府的戰後初期對日政策先有一初步的瞭解。

張羣²⁰曾於《我與日本七十年》一書中提到：

在日本投降以後，我政府除趕辦遣送日僑及日本戰俘，並派遣駐日軍事代表團協同盟軍總部處理日本的戰後問題之外，中日兩國間當然並無任何外交事務；不過我們對日本戰後所可能發生的變化，不能不表異常的關切。……究竟日本戰後的軍國主義將來是否可能利用國際局勢的變動而復活？日本民主政治是否能建立起來？將來是否還可能回到極權政治的老路？日本經濟如果復興，是否能使日本再行侵略的陰謀？或是妨害我國的經濟建設？盟軍總部執行對日管制政策是否正確？這許多問題都應求得理解，事關我國利益及今後亞洲局勢，自不能等閒視之。²¹

上述回想雖僅係張羣的個人看法，但其戰前戰後長年負責對日外交，在某種程度上，亦反映了國府對戰後日本的疑慮。此種對日本的疑慮，自然左右了國府對日本的戰後構想。

而根據日本國際關係學者山極晃指出，國府的初期對日政策，主要受到三項原因左右：（一）大眾輿論的關注，（二）參與能力的不足，（三）美國援助的依賴。經過長年與日本的軍事衝突與長達八年的戰爭，中國所受的損失相當龐大。與

20 張羣（1889-1990），1939年1月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1947年4月至1948年5月任國府行政院長。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下冊，頁1750。

21 張羣，《我與日本七十年》（臺北：中日關係研究會，1980年4月），頁96-97。

其他的戰勝國相較，對日本的戰後處理問題，中國的大眾輿論最為關心。此種輿論的關注，亦對國府的對日政策造成影響。可是，即使國府欲積極參與日本的戰後處理，亦是相當困難的。對國府而言，較之於處理戰後日本的問題，中國戰後的內部問題更為緊迫。由於國力的困窘，戰後的國府於各方面皆相當依賴美國的援助。以致對於美國所提出的對日占領政策方針，國府往往不得不加以支持配合。此外，山極晃亦指出，國府對於日本的戰後處理，最為關心的問題分別為日本的非軍事化、民主化與賠償問題等。²²

日本投降後，國府國防最高委員會曾針對如何處置日本的戰後問題，審訂了「處理日本問題意見書」參考資料。²³該「意見書」係經由何種過程與經緯作成的，現階段尚未能確定。但該參考資料除提示了國府的對日政策的基本原則以外，對於日本的政治、經濟、教育、法律等方面，亦詳列了國府的處理原則，戰後國府對日政策的最初的概要性方針透過此參考資料可窺得端倪。

根據上述「處理日本問題意見書」，可以發現在戰爭結束前後，國府最大的關心，在於全面改造軍國主義國家日本，對日本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提出了多項意見。而關於賠償問題，僅於經濟問題項目下提出：「日本工業除同盟國許可其繼續存在之和平工業以外，其餘設備應設法向同盟國交涉，移交我國，作為賠償之一部分。」就篇幅而言，較之賠償問題，日本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問題，更為國府所關心。只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相當早期的階段，拆運日本國內工業設備已成為國府對日索賠的方針之一。

1945年11月，經過外交部所召集的檢討會議，國府國防最高委員會擬訂「關於索取賠償與歸還劫物之基本原則及進行辦法」。除了確定對日索賠以實物為主、賠款為輔外，並明確規定所謂實物除中國境內（包括東北、臺灣、澎湖群島）之日本

22 山極晃，〈中華民國と對日占領〉，袖井林二郎編，《世界史のなかの日本占領》（東京：日本評論社，1985年4月），頁289-293。

23 「處理日本問題意見書—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審定參考資料」，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9月），頁637-640。其日期雖標示8月12日，但其內容中卻又提到8月14日蔣介石對日廣播一事，故無法確認其正確作成日期。

公私財產外，日本國內的現有全部商船所有權、軍需工業和重工業的工廠與設備，非平時經濟所需要的輕工業工廠與設備、現存的圖書與科學儀器等等。²⁴單就此文件的內容而言，戰後初期國府於構思對日賠償政策時，不僅嚴厲，更可謂巨細靡遺。²⁵

隨著時間的推移，儘管仍關注日本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問題，國府逐漸對賠償問題轉為積極，強調由於中國的犧牲慘重，中國於對日索賠問題上應有其特殊地位。²⁶國府之所以對賠償問題如此重視，與其賠償政策之目的有關。「此一賠償政策之目的有三：懲處日本以往罪行，以彰正義，而不壓迫其無辜之平民，一也。補償我國一部分損失，加速戰後復興，從而建立東亞經濟局勢上之均衡，二也。解除日本經濟武裝，消滅其戰爭潛力，免其重惹戰禍，三也。」²⁷國府重視賠償問題，除了所謂伸張正義外，更著眼於中國的戰後經濟復興，並希望藉削弱日本工業能力，抑制日本再起威脅的可能。

另一方面，雖然國府方面對日本賠償問題抱持著高度的關心，中國本身的國力是否能有效接收與運用日本所賠償的工業設備，美國方面於戰後稍早的時候就多少抱持著疑慮。²⁸儘管如此，賠償問題既為國府的戰後初期對日政策的主要關注點，其後自然反應在駐日代表團的實際運作與活動上。

24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9月），頁7-27。

25 殷燕軍，《中日戰爭賠償問題》（東京：御茶水書房，1996年10月），頁115。

26 「中國對日要求賠償的說帖」（作成時間不明），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日本投降與我國對日態度及對俄交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66年10月），頁307-315。

27 吳半農，〈序言〉，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編，《在日辦理賠償歸還工作綜述》（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2月，1949年9月，初版復刻），頁1。

28 「聯合國賠償委員會美國委員鮑萊自東京來函」（1945年11月26日），〈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2060100206026，光碟碼：06-00949。

叁、中國駐日代表團的沿革與組織

一、駐日代表團的性質

駐日代表團的前身，原為「中國駐盟軍總部軍事連絡官辦事處」，²⁹軍事連絡官的工作，應包括協調中國戰區的日軍日僑遣返事宜。³⁰遣返中國戰區日軍日僑的準備工作告一段落後，駐日代表團於1946年5月9日正式成立，³¹設立於日本東京麻布區廣尾町。為國府的駐日本代表，行政系統上隸屬外交部，接受其指示與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GHQ/SCAP，以下簡稱「盟總」）進行聯絡折衝。³²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於御前會議確認接受波茨坦宣言。8月15日，日本正式公告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並接受其占領與管理。之後，依盟總的指示，日本關閉其駐外之使領館，並於隨後停止其與中立國的外交關係。12月2日，盟總更進一步指示，禁止日本政府與盟總以外的同盟國駐日本代表直接交涉往來，與各外國的交涉往來需透過盟總或由盟總代為進行，至此日本政府的外交權限與機能完全遭到停止。³³由於日本其主權國家的地位遭到剝奪，占領期間的各國所謂「駐日外交代表」，交涉與來往的對象名義上是盟軍最高司令官，與日本政府的直接聯絡在理論

29 張憲文、方慶秋、黃美真主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頁1303。

30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東京會議記錄」，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9月），頁757-782。

31 「東京麥帥總部宣稱中國駐日代表人員改組成立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為朱世明」，〈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五月〉，《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2060100212009，光碟號：06-00974。

32 「賠償歸還機構關係圖」，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編，《在日辦理賠償歸還工作綜述》，頁8-9間附圖。沈觀鼎，〈對日往事追記（二三）〉，《傳記文學》，第27卷1期（1975年7月），頁43-45。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6月），頁48。張憲文、方慶秋、黃美真主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頁1303。

33 日本投降後外交權停止的經緯，參照以下書籍：鈴木九萬監修，《日本外交史·第26卷：終戰から講和まで》（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3年9月），頁59-68；江藤淳主編、波多野澄雄解題，《占領史錄》，第2卷（東京：講談社，1982年1月），頁295-382。

上是不被允許的。³⁴但是，事實上透過會談等方式，駐日代表團與日本政府方面仍有一定的聯繫。³⁵

二、駐日代表團的組織

駐日代表團的人事任免，分別由國防部與外交部掌理，在相互協議下決定。團長由國防部選派，副團長由外交部選派。³⁶首任團長為朱世明中將，³⁷團長是對日理事會（Allied Council for Japan）的組成員之一。³⁸下轄軍事、政治外交、經濟和文化教育等4組及祕書、後勤、副官、僑務等處，1948年以後並有一憲兵隊受代表團節制。1947年4月19日，曾任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的商震中將繼任駐日代表團團長，³⁹1949年3月5日朱世明再任團長，⁴⁰1950年6月何世禮中將由國防部常務次長轉

34 舊金山和約簽定以前，派遣有「駐日外交代表」的，除中華民國之外，尚有澳洲、比利時、巴西、加拿大、丹麥、法國、印度、荷蘭、挪威、菲律賓、英國、烏拉圭、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瑞典、義大利、大韓民國、泰國等，共20個國家政府。各國家政府的「駐日外交代表」與日本政府的直接往來不為盟總允許。直到1948年，貿易的相關交涉方被解禁。而一般的直接交涉要到1951年始被許可。百瀨孝，《事典昭和戰後期の日本—占領と改革》（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年7月），頁255。

35 最高裁判所事務總局涉外課，《涉外資料第7號—臺灣人に關する法權問題》（東京：同課，1950年5月，內部資料），頁1-15。

36 「憲兵司令中將黃珍吾呈參謀總長周至柔上將我駐日代表團之內部概況」（1952年8月2日），〈駐日代表團案〉，《國軍檔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檔號：062.43/7031.4。

37 「東京麥帥總部宣稱中國駐日代表人員改組成立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為朱世明」，〈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五月〉，《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2060100212009，光碟號：06-00974。

38 對日理事會以盟軍駐日最高司令官為議長，另外由美國、英聯邦、蘇聯、中國各派代表一員參加。其性質上為盟軍駐日最高司令官的協商與諮詢機關。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辭典編纂委員會編，《日本外交史辭典》（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年5月），頁522-523。

39 「國民政府特派商震為駐日代表團團長」，〈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四月〉，《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2060100223019，光碟碼：06-01025。商震（1888-1978），1943年11月開羅會議中國代表團團員，1944年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1945年任國府參軍長。秦孝儀主編，《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年6月），頁299-300。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下冊，頁2022。

40 「總統命令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商震免職特派朱世明為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八年三月〉，《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2060100250005，光碟碼：06-01163。

任代表團團長。⁴¹

駐日代表團的內部組織編制與其職掌，根據團員的回憶錄，佐以現階段可掌握的檔案，大致整理如下：

- (1) 第一組（軍事）：第一組的職掌，主要是「辦理一般駐外大使館武官處的業務」。此外，「同時透過盟總處理日軍在華戰俘及日本在華平民之遣返」，並「協調盟總辦理有關軍事個案」。「組內不設陸海空軍之軍種武官，亦不設副組長，僅編轄軍種資深參謀為其首席參謀（即軍種首席武官）」。「構成員約16人。第一任組長為李立柏少將。⁴²
- (2) 第二組（政治外交）：第二組負責政治研究及外交業務之處理。在政治方面，研究日本戰後政情、政制變革、國會組成、憲法制定等，並作成建議案，提供本國參考。外交方面，承辦僑務處及代表團上呈業務，其與盟總之對口單位為盟總外交組。編制10人，成員多來自外交部，組長長期由吳文藻擔任。⁴³
- (3) 第三組（經濟）：第三組之職掌，係研究盟總的戰後對日經濟政策與中日戰爭賠償問題。下設賠償研究執行委員會。原正式編制20餘人，後為因應對日索賠事宜，以增加額外人員的方式，讓與日本賠償問題有關的大小國府機構紛紛派員以駐日代表團團員的身分進駐日本。國府重視對日索賠事宜，由此可見。組長長期由吳半農擔任。⁴⁴

41 何世禮（1906-1998），曾赴英、法、美學習軍事，二戰中歷任青年遠征軍兵站副監、聯合後勤總司令等職。何世禮先生治喪委員會，〈何世禮先生生平事略〉，《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5期（1998年12月），頁287。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上冊，頁664。

42 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68-69。李立柏（1903-1974），二戰中任軍令部第二廳參謀，歷任科長、副處長、處長。來臺後曾任保安司令部中將參謀長、警備總部副司令。1966年退役後，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局長。徐有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上（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頁469。

43 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69。

44 有關第三組大幅增員一事，代表團團員鍾漢波敘述如下：「成立之初，二十多名員額一下子就被政府各部會人員所占滿。以致實際需要索賠之單位如經濟部、財政部、資源委員會、甘肅油礦管理局、海關總署、陸軍兵工署、招商局、江南造船廠及上海工商聯合促進會等紛紛申請額外員額，要求派員前來日本成為駐日代表團成員，以便索取日本賠償。我政府鑒於事實需要，均一一予以批准。」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70。

- (4) 第四組（文化教育）：掌理有關教科文業務，對華僑學校的協助與督導，亦為業務之一。⁴⁵
- (5) 內勤各處：祕書處，轄有文書室、譯電室；副官處，轄有隨員室、公關室及預財室。撰寫《萬曆十五年》的明史學者黃仁宇便於1949年至1950年間於代表團擔任副官的職務；⁴⁶後勤處，轄有公務汽車調度室、電話總機房、醫務所、日本人事務所。⁴⁷
- (6) 憲兵隊：於1948年2月以後進駐，由上尉1名與士兵12名組成。憲兵隊隊長由李建武上尉擔任，由團長直接指揮。其存在的意義在於「象徵占領軍的勢力」。⁴⁸
- (7) 僑務處：由總領事銜的處長1名與10餘名人員組成，處理旅日華僑的相關業務。另有駐橫濱、神阪、長崎三地分處。⁴⁹
- 此外，尚有法律處、商務處等單位，惟其職掌與活動尚未能確定。⁵⁰（初步整理的組織圖與主要機構成員，參閱表1）

由目前可確定的代表團主要幹部學經歷來看，儘管代表團名為「駐日」代表

45 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70。

46 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頁152-171。

47 所謂日本人事務所，根據代表團團員鍾漢波敘述如下：「專責管理日籍男女工人，含派往團員眷舍CMD女傭六十人左右，大餐廳侍女十餘人以及各單身宿舍女清潔工若干人；男工則有水電工、水泥工、木匠、瓦匠、鍋爐工、暖氣工、園丁、花匠以及環境道路整潔工等不下百餘人，均向日本政府徵用，薪資由日本政府給付。」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70-71。

48 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頁154。有關國府派遣憲兵隊赴日之始末，參閱黃文德，〈中華民國對日派遣占領軍之問題—以駐日憲兵隊為討論中心〉，《憲兵半月刊》，第63期（2006年9月），頁114-128。

49 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二五）〉，《傳記文學》，第27卷第4期（1975年10月），頁89。外交部檔案資訊處編，《外交部駐外使領館沿革一覽表》（臺北：外交部，1980年2月），頁6-8。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71。

50 「憲兵司令中將黃珍吾呈參謀總長周至柔上將我駐日代表團之內部概況」（1952年8月2日），〈駐日代表團案〉，《國軍檔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檔號：062.43/7031.4。

團，主要幹部中除了沈觀鼎⁵¹、張鳳舉⁵²與謝南光⁵³外，多與日本無淵源。特別是擔任重要職務者，例如朱世明（團長）、吳文藻（第二組組長）、吳半農（第三組組長）等多為留美出身。其原因應該在於駐日代表團的主要任務，係在與盟總交涉協調，而並非與敗戰國的日本政府往來。日後代表團與在日華僑、在日臺灣人與留日學生間的所產生的摩擦，在某種程度上亦應與相互間出身背景的差異有關。

表1：駐日代表團組織圖與構成人員

年別 職稱	工作職掌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團長		朱世明	朱世明 商震	商震	商震 朱世明	朱世明 何世禮
副團長		沈觀鼎	沈觀鼎	沈觀鼎	沈觀鼎	汪公紀
第一組	軍事	李立柏	王丕承	王丕承 王武	王武 曹士澂	不詳
第二組	政治外交	沈觀鼎 (兼) 吳文藻	吳文藻	吳文藻 謝南光 (副)	吳文藻 謝南光 (副)	不詳
第三組	經濟	吳半農	吳半農 林可儀 (副)	吳半農 林可儀 (副)	吳半農 林可儀 (副)	不詳

51 沈觀鼎（1894-2000），東京帝國大學畢業，二戰前曾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參閱民國人物小傳編輯委員會，〈民國人物小傳（301）—沈觀鼎〉，《傳記文學》，第77卷第1期（2000年7月），頁137-138。

52 「…組長張鳳舉先生出身教育部，早年留學日本，居留日本時間甚長，對於日本國內各情勢均甚熟悉…」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70。

53 謝南光（1902-1969），係長期從事臺灣民族運動的代表人物。謝於抗戰開始前已加入國府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蒐集日軍情報工作，並於1943年11月擔任臺灣革命同盟會主任委員。參閱許雪姬編，《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5月），頁1297。國府選派其出任駐日代表團，且令其擔任第二組副組長，除考量其對於日本有著相當的瞭解以外，亦應有欲透過其以達宣慰在日臺灣人的目的。惟從目前可掌握的資料，包括謝本身所著與此時期有關的著作當中，尚無法確認謝是否曾於此時期積極扮演了代表團與在日臺灣人之間溝通橋樑的角色。謝南光有關戰後初期日本的著作有：《敗戰後的日本真相》（臺北：民報印書館，1946年10月）等。

第四組	文化	張鳳舉	張鳳舉 郭心崧	不詳	不詳	不詳
僑務處	僑務	劉鎮華 林定平	林定平	林定平	林定平	不詳
祕書處	文書室 譯電室	李秉漢	崔思瑗	崔思瑗	崔思瑗	不詳
副官處	隨員室 公關室 預財室	阮維新	阮維新	阮維新	阮維新*	不詳
後勤處		許振南	阮維新 錢明年	不詳	不詳	不詳
顧問		李立柏 劉馭萬	不詳	張鳳舉 徐逸樵	張鳳舉 徐逸樵	不詳
憲兵隊				李建武	李建武	李建武
專門委員		郭彝民 龔 鉞 徐敬璋	郭彝民 龔 鉞 徐敬璋 王樹芳 李待琛 王信忠 朱炳南 崔萬秋 王德立 陳耀庭 邵逸周	郭彝民 龔 鉞 徐敬璋 王樹芳 李待琛 王信忠 朱炳南 崔萬秋 王德立 陳耀庭 邵逸周	不詳	不詳

註：阮維新在《黃仁宇回憶錄》中作「袁韋新」，應係英譯上之錯誤。

參考資料：

「憲兵司令中將黃珍吾呈參謀總長周至柔上將我駐日代表團之內部概況」（1952年8月2日），〈駐日代表團案〉，《國軍檔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檔號：062.43/7031.4。

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二五）〉，《傳記文學》，第27卷第4期（1975年10月），頁89-92。

張朋園、沈懷玉編，《國民政府職官年表》，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6月），585頁。

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6月），頁68-71。

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1月），153頁。
張憲文等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1,303頁。

三、駐日代表團的待遇

由於駐日代表團團員具有占領軍身分，享有外交豁免特權，即使觸犯盟總規定，只要未涉及對他國人士發生民事或刑事案件，均由代表團內部自行處理。「代表團約有120位成員，車陣包括1輛巴士和30輛以上的轎車」，且「私人的車輛不包括在內。」代表團的正式人員薪資由外交部以美元支付，住宅與補給則是透過徵收，由日本政府負責提供。美軍軍中販賣部（post exchange，PX）與提供給盟軍的醫療、娛樂、休閒設施，亦可同等使用。此外，日常生活方面，尚有前述之後勤處日本人事務所專責服務。⁵⁴代表團之規模與所受優遇，由此得以管窺。相較當時部分在日華僑與在日臺灣人，尚需依賴黑市買賣方得餬口渡日，駐日代表團與其眷屬的優渥生活便顯得突兀。國共內戰加劇後，中國本土幣值大跌，物價飛漲，領美元薪水的代表團團員生活相對穩定，自然亦引人側目。

四、賠償歸還代表團的派遣

1944年，國民政府於行政院下成立了「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為調查中國於中日戰爭間所受損失的正式專責機構。可是由於該委員會之後歷經多次改隸與合併，實際上的工作成效頗有值得懷疑之處。國府真正開始著手調查戰爭損失，應為戰爭正式結束以後。惟其時間匆促，調查亦僅限於國府行政系統所能掌握之區域，其結果之可信度與精確度，實有再查考之必要。⁵⁵

54 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頁139、154-155。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119-126。

55 川島真，〈歷史學からみた戦後補償〉，奧田安宏、川島真等，《共同研究中國戰後補償—歷史・法・裁判》（東京：明石書店，2000年2月），頁13-47。國府著手調查戰爭損失的經緯，參考遲景德，《中國對日抗戰損失調查史述》（臺北：國史館，1987年3月）；遲景德，〈從抗戰損失調查到日本戰敗賠償〉，《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6年9月），頁1319-1353。

駐日代表團成立初期，由其掌管經濟事項的第三組負責日本賠償歸還事宜。1947年7月，依盟總規定，設立「中國賠償歸還代表團」，代表國府與盟總接洽日本賠償歸還事宜，代表5人，技術事務佐理人員20人。實際上，由於賠償歸還代表團的各代表與技術事務佐理人員皆由第三組成員兼任，故所謂賠償歸還代表團僅為一對外機構，於駐日代表團內部，一切有關賠償歸還之事項仍由第三組辦理。1947年9月，國府又成立「日本賠償及歸還物資接收委員會」，隸屬駐日代表團，受團長節制。其與第三組劃分職權，「除（一）關於公私機構之未履行合同事項及（二）關於中日間金融及商業債務清理事項」仍由第三組辦理外，其他有關賠償歸還之業務以及調查研究工作皆由接收委員會辦理。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賠償歸還代表團」與「日本賠償及歸還物資接收委員會」分別有其組織章程與成立背景，但實際上成員皆係同一批人，對外行文用「中國賠償歸還代表團」名義行文或洽辦，對內以「日本賠償及歸還物資接收委員會」之組織運作。⁵⁶之所以如此疊床架屋，究其原因應該在於「中國賠償歸還代表團」名義上為代表中國與盟總交涉的單位，就形式上，其與駐日代表團並不相隸屬。但是為了有效掌握賠償與歸還事宜的推動與管制，國府另外於駐日代表團的內部成立一受團長直接指揮的組織——「日本賠償及歸還物資接收委員會」，並以同一批人員同時充任兩組織的職務。對外，在表面上「中國賠償歸還代表團」係一自主單位，實際上卻受到駐日代表團所直接掌握與節制。

56 有關國府於日本成立專責賠償事宜機構的經緯，參閱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編，《在日辦理賠償歸還工作綜述》，頁11-15；遲景德，〈戰後中國向日本索取賠償研究〉，《抗戰建國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7月），頁498-547。

五、駐日代表團的裁撤

駐日代表團的聯繫與運作，形式上係由外交部統籌辦理，但實際上代表團並非一有共同信念與宗旨的統一單位，其性質接近於國府內部不同機關派駐日本之代表的組合。除了外交部系統以外，尚有監察院、國防部、資源委員會等等。黨系統與特務組織亦以微妙的方式參與其間。⁵⁷例如，代表團第二組組長的吳文藻與妻子著名作家謝冰心，儘管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卻對美國的對日政策與國府抱持著相當的不滿。⁵⁸正因如此，欲使代表團內部團結一致，其實並非易事。

而隨著國共內戰進程國府的敗戰跡象益濃，駐日代表團內的成員亦不免有所動搖，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前後，遂有謂「葉山會議」與「易幟騷動」事件先後發生。⁵⁹而隨著承認北京新政權國家的增加，駐日代表團可聯繫往來交涉的對象亦逐漸減少。⁶⁰代表團與日本政府方面原本即無法有正式的往來，故

57 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頁156。

58 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69、131；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頁162。謝冰心滯日期間，曾於東京大學擔任講師，講授中國文學。其授課內容收錄於謝冰心著、倉石武四郎譯，《中國文學をどう鑑賞するか》（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9年9月）。日本的中國思想文學研究者竹內實曾擔任其授課翻譯。荻野脩二，〈謝冰心的一面—したたかさ—〉，《中國文學會紀要》，第27號（2006年3月），頁1-14。

59 駐日代表團在離東京約五十哩的葉山有間賓館，作為週末休閒娛樂之用。所謂「葉山會議」，根據副團長沈觀鼎所撰寫的回憶錄，謠傳1949年8月中美關係白皮書發表數日以後，團長朱世明於週末在葉山舉行秘密會議，交換對該白皮書的意見。第二組組長吳文藻夫婦與第三組組長吳半農等皆與會，惟沈觀鼎並未參加。而同年10月，又謠傳吳文藻、吳半農等有於雙十節當日扯下國旗的陰謀云云，是為「易幟騷動」。參考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三四）〉，《傳記文學》，第29卷第6期（1976年12月），頁120-121。而根據黃仁宇的回憶錄，此事原僅係朱世明和資深幹部彼此交換意見。適其時傳出有駐日代表團將仿效駐法大使館宣布轉移效忠對象的謠言。類似的謠言，融入所謂葉山會議的故事中並傳回臺北，日後成為導致朱世明去職的導火線。其中不但存在代表團內部的私人紛爭，似更牽涉到國府內部的派系衝突與私人恩怨。參閱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頁161-171。惟此兩事件現似尚未見諸已公開的檔案資料，且於回憶錄中提及此事的各人又多語焉不詳，故現階段尚難以釐清詳情。中國大陸學界就葉山事件撰文者有李亞風，惟其文除引用黃仁宇與謝冰心的回憶錄以外，所參考之文獻多為二手資料，亦未就事件來龍去脈有所說明。參閱李亞風，〈葉山會議風波之解構——關於1949年末國民黨政府駐日代表團內部政治衝突的分析〉，《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2期（2006年3月），頁104-107。

60 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頁156。

1949年以後，駐日代表團的外交活動呈現停滯的狀態。考察其原因，與其說是駐日代表團效能不彰，毋寧應歸咎於國府國際地位的低落。

另一方面，國府對駐日代表團亦不抱信任，對其工作成果尤表失望。1950年，當時任行政院院長的陳誠，即致函外交部部長葉公超，指責駐日代表團「汽車多逾百輛，多係私人所有而假借代表團名義」、「領乾薪者多，各有政治背景，傾軋甚烈，代表團被譏為『代表中國團』」、「由於過去代表團之腐敗，及團員經營黑市買賣，盟總對團印象惡劣已極」。⁶¹其指摘是否屬實現尚難以證實，但或許得以推測駐日代表團的工作表現並不為國府中央所滿意外，亦透露出當時國府對駐日代表團並無法完全掌握與有效管理。

1951年9月舊金山和約簽訂，翌年4月28日生效，日本重新恢復獨立自主地位。對日理事會的法理基礎，亦不復存在。1952年4月28日同一天，國府與日本於臺北簽訂中日和平條約。1952年8月5日，國府與日本交換中日和平條約批准書，條約正式生效。至此，中華民國與日本間的戰爭狀態正式結束，國府於同日恢復駐日本大使館，同時駐日代表團亦正式裁撤。

肆、駐日代表團的主要業務與工作成果

一、中國新國際地位的象徵

駐日代表團的團長是對日理事會的組成員之一，對日理事會以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為議長，另外由美國、英聯邦、蘇聯、中國各派代表1人參加，其性質上為盟軍駐日最高司令官的諮詢機關。儘管對日理事會於政治決策過程中實質上並未扮演積極的角色，卻仍是同盟國共同占領日本的象徵。駐日代表團的團長以中國代表的身分參加對日理事會，亦象徵著中國以戰勝國的地位參與日本的占領與管理。儘管行政系統上代表團受國府外交部節制，曾任代表團副團長的沈觀鼎亦認為代表團的

61 「抄送駐日代表團報告」（1950年6月26日），〈駐日代表團人事〉，《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070.4/0006。

性質上接近軍事代表團。⁶²

二、華僑的保護與管理

日本為同盟國所占領以後，華僑被視為戰勝國國民，其刑事案件不受日本法權管轄，而受占領軍法庭審理。軍事法庭通常由占領軍所派法官3名構成，其中1名需由當事的戰勝國國民所屬國籍國派任。因此，僑務處成員除辦理僑務以外，必要亦必須兼任軍法官參與有關華僑的審理案件。⁶³盟總亦曾明白要求駐日代表團需擔負起約束管理華僑的責任。⁶⁴駐日代表團需定期向本國呈報「一般業務報告」，其中「駐日代表團僑務處工作報告」裏，多是記載著有關華僑違法犯罪的內容與相關審判的結果等。對駐日代表團而言，華僑犯罪問題，一直是個嚴重的問題，如何既達成保護僑民工作，又要「勸告僑民安分守法，戒告僑民防止麻醉藥案」，⁶⁵兼顧管理華僑工作，代表團實有其兩難之處。

三、軍品購入的聯繫協調

曾任職於駐日代表團擔任首席海軍武官的鍾漢波，曾於其回憶錄中敘述其任職的第一組（軍事）之業務職掌，包括「協調盟總裝載彈藥運回臺灣」。⁶⁶至於細節部分，僅提到韓戰爆發以後，於1950年8月間，其曾代表國府海軍辦理軍購，向盟軍總部購入美軍標準艦用砲彈一批。⁶⁷事實上，早於1948年5月，便曾有沖繩本島西方的伊江島村長向琉球政府報告了國府軍隊派遣船隻與百餘人員，至該島搬出

62 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二五）〉，《傳記文學》，第27卷第4期（1975年10月），頁91。

63 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二五）〉，頁92。

64 「駐日代表團朱世明團長電報與麥克阿瑟將軍晤談要點」（1947年1月15日），〈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一月〉，《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2060100220015，光碟碼：06-01012。

65 「駐日代表團一般業務報告」（1951年5月-1951年10月），《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070.4/0003。

66 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69。

67 「…獲得美軍標準艦用砲彈總數為：三吋砲彈一萬九千六百發。四十公釐高平兩用防砲砲彈六萬四千發（每箱十六發一共四千箱）。二十公釐高平兩用機砲砲彈三十六萬發（每箱一百二十發一共三千箱）。」參閱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142。

美軍暫存的堪用彈藥軍品運往上海一事，而國府軍隊的行動似已事先獲得美軍的同意。⁶⁸當時琉球群島（今日本沖繩縣）係由美國實施單獨軍事占領，與日本本土於法理上係由同盟國共同參與占領與管理並不相同。惟於1946年7月以後，日本本土與琉球群島兩者實際上皆置於盟總的管制之下。⁶⁹國府雖無代表駐於琉球群島，但國府能夠在美軍瞭解下，由琉球群島搬出美軍閒置的彈藥軍品，亦應與駐日代表團從中協調有關。

四、戰爭賠償問題的調查與接收

配合本國對賠償問題的關注，駐日代表團對於戰爭賠償問題的調查與接收，投入相當大的人力與物力，擔任與賠償問題相關工作的人員，亦為代表團成員的主力。「我國為執行日本賠償歸還工作，曾動員多人。單以在日之人員而論，經常總在三、四十人；三年之間，先後參加此項工作者已達百人左右，大部分為技術專家，且不乏碩師巨匠在內，足見我國對於此一工作之注重」。⁷⁰而其工作成果可大致整理如下：

（一）接收日本海軍剩餘艦艇

接收日本賠償物資工作中，較早且順利達成的係接收日本海軍剩餘艦艇。「自日本投降後，所有日本軍艦均經盟國解除武裝，其中戰艦、航空母艦、以及潛水艇均經美國沉毀，自驅逐艦以下，則由中、美、英、蘇平均分配，以抽籤決定之」。而「接收之日艦，多係戰時出品，構造均較簡陋，且所有武器及電信設備等在日本投降時，遭全部破壞」，而且「因該項船隻，原為軍艦，其艦體構造及一切設備均不能改作他用，即其各項配件之補充亦甚困難」。⁷¹但由於戰爭結束時，國府的海

68 「中國軍による爆彈搬出報告の件」（1948年5月26日），〈軍指令及一般文書1948年5-4〉，《琉球政府文書》，沖繩公文書館所藏，閱覽用檔號：0000079158，保存用檔號：R00000442B。

69 百瀬孝，《事典昭和戦後期の日本—占領と改革》（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年7月），頁9。

70 吳半農，〈序言〉，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編，《在日辦理賠償歸還工作綜述》，頁1。

71 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9月），頁612。

軍幾乎已可說是名存實亡，已成為「沒有艦艇的海軍」。⁷²因此，儘管所接收之日軍剩餘軍艦狀況並非良好，國府接收後仍將堪用者納入編制，重新予以武裝。國府高層似亦相當重視此項接收事宜，⁷³將日本賠償軍艦當成主戰兵力使用，有異於英美，或就地拆除支解，或拖出外海炸沉的處置方式。駐日代表團四次接收日本海軍剩餘艦艇，日後亦投入於國共內戰中，分別為國共所使用。駐日代表團所接收的日本海軍剩餘艦艇共34艘，總噸位35,598噸。（參閱表2）⁷⁴

72 鍾漢波，《海峽動盪的年代：一位海軍軍官服勤筆記》（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1月），頁10-11。

73 日本賠償軍艦的抽籤、接收與到埠的細節情形由海軍總司令逐一呈報蔣介石。例如，「海軍總部桂永清總司令呈報接收第二批日方賠償戰艦八艘」，〈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八月〉，《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2060100227011，光碟號：06-01042。其內容如下：「八月十一日一原呈報「第二批日艦，計驅逐艦二艘、護航驅逐艦六艘、共計八艘（八千四百五十噸），業於午儉進入吳淞口，上午舉行升旗典禮，日本員、兵於是午乘日本護送艦若鷹離港返日」；又如，「桂永清總司令呈報已接收第三批日方賠償戰艦八艘（1947年8月20日）」，〈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八月〉，《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2060100227020，光碟碼：06-01044。其內容如下：「桂永清總司令呈報已接收第三批日方賠償戰艦八艘…原呈稱，第三批日艦業於八月十三日在東京籤分，我方抽得驅除艦一艘，護航艦六艘，運輸艦一艘，共10,755噸，各艦約八月二十六日離佐世保駛青島，交我國接收。」

74 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162-181。陳孝惇利用《國軍檔案》耙梳了國府接收日本賠償軍艦的經緯與細節。參閱陳孝惇，〈戰後日本賠償艦艇之接收編組及其意義〉，《中華軍史學會會刊》，6（2001年8月），頁173-213。曹劍浪的《國民黨軍簡史》，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1月），於頁1510-1513亦對國府接受日賠軍艦有所著墨。惟該書對各艦艇名稱等細節的敘述，與其他相關資料頗有出入，且未標明詳細引用出處，故未予引用。

表2：國府駐日代表團接收日本海軍剩餘艦艇一覽

次別	接收日期	接收艦艇 艦種名稱	國府接收後 改編	國共內戰後	駐日代表團 接收代表	中國 入港 處
第一次	1947年 7月上旬	驅逐艦雪風	單陽號驅逐艦	移轉臺灣	鍾漢波 少校	上海
		驅逐艦楓	衡陽號驅逐艦	移轉臺灣		
		驅逐艦初梅	信陽號驅逐艦	移轉臺灣		
		海防艦四阪	惠安號巡防艦	中共東海艦隊		
		海防艦第14號	未命名未服役	中共東海艦隊		
		海防艦第194號	威海號巡防艦	中共北海艦隊		
		海防艦第67號	營口號巡防艦	移轉臺灣		
		海防艦第215號	遼海號巡防艦	移轉臺灣		
第二次	1947年 7月下旬	驅逐艦薦	華陽號驅逐艦	移轉臺灣	姚瑛 上校	上海
		驅逐艦杉	惠陽號驅逐艦	移轉臺灣		
		海防艦對馬	臨安號巡防艦	移轉臺灣		
		海防艦第118號	未命名未服役	中共東海艦隊		
		海防艦第192號	同安號巡防艦	移轉臺灣		
		海防艦第198號	未命名未服役	中共北海艦隊		
		海防艦第85號	吉安號巡防艦	投共後遭炸沉		
		海防艦第205號	新安號巡防艦	移轉臺灣		
第三次	1947年 8月	驅逐艦宵月	汾陽號驅逐艦	移轉臺灣	鍾漢波 少校	青島
		海防艦隱岐	固安號巡防艦	中共南海艦隊		
		海防艦屋代	威臺號巡防艦	移轉臺灣		
		海防艦第40號	成安號巡防艦	移轉臺灣		
		海防艦第104號	泰安號巡防艦	移轉臺灣		
		海防艦第81號	黃安號巡防艦	中共東海艦隊		
		海防艦第107號	潮安號巡防艦	移轉臺灣		
		運輸艦第16號	武彝號運輸艦	移轉臺灣		

第四次	1947年 10月上旬	驅逐艦波風	瀋陽號驅逐艦	移轉臺灣	姚璵 上校	青島
		輸送艦第172號	廬山號運輸艦	移轉臺灣		
		運送艦白崎	武陵號運輸艦	移轉臺灣		
		水雷敷設艦濟州	永靖號布雷艦	移轉臺灣		
		水雷敷設艦黑島	未命名未服役	移轉臺灣		
		獵潛艦追49	海宏號巡邏艦	移轉臺灣		
		驅潛艇追9	海大號巡邏艇	移轉臺灣		
		掃海特務艇萬14	掃雷201艇	投共		
		掃海特務艇萬19	掃雷202艇	移轉臺灣		
		掃海特務艇萬22	掃雷203艇	移轉臺灣		

參考資料：

編輯部，〈艦隊別・日本海軍艦隊總覽〉，《別冊歷史讀本》，第133號（1990年11月），頁231-305。

編輯部，〈第3部・日本海軍軍艦總覽Ⅱ〉，《別冊歷史讀本》，第414號（1997年7月），頁135-197。

鍾堅，〈日本賠償艦艇性能諸元及重要記事〉，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183-251。

太平洋戰爭研究會，《大日本帝國海軍全艦艇》（東京：世界文化社，2008年8月）。

（二）索還掠奪物資與文物

所謂掠奪物資與文物的定義，係「凡日方在占領區內強徵、勒購、或劫奪之資產均稱為被劫資產，經所有國證明確屬原物時，得向盟總申請歸還」。而國府索還的被劫物資，包括：書籍、古物、貨幣、整廠機器設備、零散計件機器、車輛、船舶、工業原料、貴金屬等。除運回中國本土外，部分亦就地於日本出售。⁷⁵

其中較為特殊的應屬於甲午戰爭中被俘後，陳列於上野公園不忍池畔的「鎮遠」與「定遠」兩艦錨。因其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發生事項，不屬於所謂歸還被劫物資的範圍，故盟總起初並不同意代表團的歸還要求，儘管如此，駐日代表團仍多次向盟總交涉要求，終使其同意。除了被掠奪的物資與文物以外，如何去除中國

75 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編，《在日辦理賠償歸還工作綜述》，頁93-121。

過去屈辱象徵，亦為駐日代表團所關心的事項。⁷⁶經歷八年戰時生活洗禮的駐日代表團團員，其心中的民族主義情緒，或多或少由此略可推測。在駐日代表團成員與在日華僑或在日臺灣人的互動上，此種情緒亦為影響原因之一。

（三）軍事工業生產設備的拆運

1947年4月，先期拆遷計畫開始執行，盟總選定日本陸海軍兵工廠18所，拆運其機械設備，分三批按3：1：1：1之比例，分配予中國、英聯邦、荷蘭與菲律賓。拆遷工作之進行並不如駐日代表團人員所期望般順利，除盟國間的相互掣肘外，盟總的消極對應亦為原因之一。⁷⁷盟總的消極態度，除不欲增加對日占領的經濟負擔以外，亦與美國的對日政策由預防壓抑，逐漸調整成協助日本經濟復興有所關係。之後，先期拆遷計畫之執行於1949年5月宣告中止。國府的以拆運日本生產設備為主軸的對日索賠計畫，至此劃上了句點。比較特別的是，第三批物資的部分，由於受國共內戰的影響，改運往臺灣，於1949年7月底抵達基隆，並且由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分配予臺灣各生產單位。⁷⁸原為國府計畫運用於戰後中國經濟重建的日賠物資，卻因國共內戰之故，轉為臺灣戰後重建的資材。

五、其他

除上述工作事項以外，駐日代表團亦從事下列諸項業務：

- （一）1948年盟總由貿易事項開始，逐漸放寬各國代表團與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往來以後，駐日代表團接受本國各機關委託在日代辦購買物料。⁷⁹

76 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50-56。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二四）〉，《傳記文學》，第27卷第3期（1975年9月），頁71。

77 有關駐日代表團辦理日本軍事工業生產設備拆運的經緯，參閱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編，《在日辦理賠償歸還工作綜述》，頁61-78。

78 孟祥瀚，〈戰後運臺之日本賠償物資研究〉，《興大歷史學報》，第10期（2000年6月），頁21-57。

79 「行政院代電卅九（三）第六一九號」（1950年2月23日），《總統府公報》，第247號（1950年2月28日），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查詢系統，系統識別號：E0606204。

(二) 協助教育部向日本方面查證留日學生之學歷成績，「臺灣戰後初期留日學生之召回與甄審工作，駐日代表團實居重要之角色與地位」。⁸⁰

(三) 情報蒐集為重要工作之一。例如，駐日代表團便曾奉蔣中正指示調查關東軍遺留於東北之武器彈藥品量。⁸¹駐日代表團團員鍾漢波，亦於其所著之回憶錄中提及些許蛛絲馬跡。⁸²

惟就上述業務內容而言，實已與一般駐外使領館所發揮的外交功能無異。

伍、駐日代表團的困境—以澀谷事件為例

一、事件的發生與解決

所謂「澀谷事件」，係指於1946年7月19日發生於東京澀谷的在日臺灣人與日本人警察官之間所發生之武裝衝突事件。事件發生直接原因，在於日本人警察官強化取締黑市，以及在日臺灣人與日本人暴力團組織間的地盤鬥爭。若更深入追究其遠因，則牽涉到臺灣人的國籍變更問題。⁸³事件的詳細發生經緯，由於現存資料有著不少的相互矛盾，所以尚難以說是已獲得定論。根據國府的某一報告書，在日臺灣人計死亡1名，輕重傷數名，遭到逮捕者共41名；日本人警察官方面，計死亡1名。⁸⁴

80 林清芬，〈戰後初期我國留日學生之召回與甄審（1945-1951）〉，《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0期（2006年12月），頁97-128。

81 「駐日代表團電外交部第683號（1948年10月4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2080103065008，光碟碼：08A-01355。

82 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頁129-133。

83 何義麟，〈澀谷事件と2・28事件〉，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國際關係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年6月），頁206-207。

84 「外交部電送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東京澀谷事件資料」（1947年1月27日），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資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二）》（臺北：國史館，1998年6月），頁334-336。

同年12月10日，事件中遭逮捕的在日臺灣人被宣判有罪，駐日代表團第二組組長吳文藻隨即向盟總外交組（Diplomatic Section，DS）組長艾其絲（George Atcheson Jr.）提出異議，但並不為其所接受，反質疑國府方面意圖利用澀谷事件煽動輿論，攻擊盟總和美國對日政策。⁸⁵此外，同年12月20日，為了表示對澀谷事件的判決結果表示不滿，在政治建設協會的主導下，在臺北市發動了規模5,000人的抗議活動。⁸⁶

澀谷事件發生後，國府與美國方開始著手就在日臺灣人的地位問題進行交涉。在交涉的過程中，主要的癥結在於：在媾和條約締結以前，能否明白地確定臺灣人的身分地位問題是否可行。最後，經過駐日代表團與盟總方面的交涉往來，這問題於1947年2月暫時性的解決。⁸⁷儘管在日臺灣人仍未獲得全面性的承認，得以與一般的中國人同樣地享受戰勝國國民的特權地位，但實質上，若前往駐日代表團完成登記的在日臺灣人，在許多方面，如食糧配給等，可獲得了與一般中國人相等的待遇。⁸⁸

就澀谷事件的性質而言，實係原殖民地之臺灣與前宗主國之日本間於二戰後所發生的首件摩擦。此事件原應為臺灣與日本間清算殖民—被殖民關係，整理彼此間尚未著手之法律問題的契機。就臺灣與日本而言，分為「去殖民地化」與「去帝國化」的課題，但最後卻以接收臺灣的國府與占領日本的美國之間的外交折衝作為收場。

85 「外交部電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駐日代表團交涉澀谷事件情形」（1946年12月30日），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資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二）》，頁331-332。

86 何義麟，《二・二八事件—「臺灣人」形成のエスノポリティクス》（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3年3月），頁134-135。

87 最高裁判所事務總局涉外課，《涉外資料第7號—臺灣人に關する法權問題》（東京：同課，1950年5月，內部資料）。松本邦彥解說・譯，《GHQ日本占領史第16卷外國人の取り扱い》（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6年12月），頁84-86。「臺灣人民在日本待遇問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卷號：4910/檔號：067/10。

88 松本邦彥解譯，《GHQ日本占領史第16卷外國人の取り扱い》（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6年12月），頁85。

二、華僑保護與戰勝國體面的兩難

當澀谷事件的判決結果傳到中國本土與臺灣時，駐日代表團亦成了輿論批判的焦點。認為其保護華僑不力，傷害了中國作為戰勝國的體面。另外一方面，駐日代表團的某些成員對於部分華僑與在日臺灣人的作為頗有微詞。事件發生之初，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的反應並不以在日臺灣人為是。「聽報告後，面露不悅，似對臺僑無甚好感，謂其平素行為有逾軌之處，並誤認為已能享受聯合國人民待遇，係釀成本案主因」。⁸⁹ 另一方面，國府的外交部似相當重視本案，針對此事件與駐日代表團之間有相當頻繁的文電往來。⁹⁰

由此可見，儘管澀谷事件發生後，包括團長，駐日代表團內部亦有人認為，在日臺灣人於日本從事盟軍所禁止的行為，本應受到約束取締的看法。可是受到輿論與本國的壓力，儘管對部分在日臺灣人的作為不表認同，卻不得不對其享受華僑特權的身分加以維護與爭取。考其原因，除事關中國作為戰勝國的威信外，亦有可能是考量到，若在日臺灣人的華僑身分無法獲得盟總支持，國府接收臺灣的有效性恐於日後遭到質疑。而儘管臺灣社會與中國本土輿論對駐日代表團頗有微詞，認為其未盡到保護華僑、維護中國體面的責任。但事實上，之後願至駐日代表團辦理登記的在日臺灣人，即受駐日代表團的保護與管理。透過駐日代表團，國府已儼然成為大部分在日臺灣人的保護者與管理者。

陸、結語

對國民政府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不但意味著與日本長年相對抗的勝利，更象徵著自19世紀末葉以來中國所受屈辱的雪除。戰後的中國由所謂的半殖民地搖身一變為主要戰勝國，而中國的國際地位亦由三等國躍升至所謂世界四強之

89 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二七）〉，《傳記文學》，第27卷第6期（1975年12月），頁79-80。

90 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二九）〉，《傳記文學》，第28卷第3期（1976年3月），頁79-80。
有關澀谷事件的一部分國府外交部與駐日代表團之文電往來，可見於〈澀谷事件（1946-1947年）〉，《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35/172-1/1076（檔案管理局系統識別碼：0000339323）。

一。對中國而言，日本的對華政策長久以來阻礙其國際地位的向上提升，而對日抗戰的勝利帶來了其國際地位的轉變。⁹¹

國府對於日本的戰後處理，最初將關心點置於日本的非軍事化、民主化以及賠償問題的處理。但其關心的重點逐漸轉移到賠償問題，其目的除了在於希望弱化日本經濟能力，抑制其軍國主義再起的可能性外，主要還是著眼於透過接收日本的輕重工業的廠房設備，擴充提升中國的工業生產能力與規模，進而充實國力，強化戰後重新取得的大國地位。

駐日代表團團長代表中國，以主要國家代表的資格，參加對日理事會，亦象徵著中國的新國際地位。駐日代表團的存在，其意義便在於代表著中國作為戰勝國，參與了同盟國對於日本所實施的占領與管理行為。駐日代表團在性質上，係具有外交機能的軍事代表團；其被賦予的主要任務是與盟總的交涉協調，包括保護華僑、情報蒐集、物料價購等工作亦為其任務之一。事實上，駐日代表團最為重視，投入最多人力、物力與精神的業務，則是賠償物資的調查與接收，這實際上反映了國府對日本的戰後構想之真正主軸所在。

1946年7月所發生的「澀谷事件」，係原殖民地之臺灣與前宗主國之日本間於二戰後所發生的首件摩擦。此事件原應為臺灣與日本間清算殖民／被殖民關係，整理彼此間尚未著手之法律問題的契機。就臺灣與日本而言，分別為「去殖民地化」與「去帝國化」的課題。但最後卻以接收臺灣的國府與占領日本的美國之間的外交衝突作為收場。此外，該事件除凸顯出戰後過渡時期的臺灣人國籍變更問題以外，於問題解決的政治過程中，亦反映出駐日代表團與在日華僑、在日臺灣人間互動的隔閡。部分駐日代表團團員儘管對某些在日臺灣人的作為不表認同，卻不得不對其華僑身分加以維護與爭取。若在日臺灣人的華僑身分無法獲得盟總認同，除關係到中國的威信外，國府接收臺灣的有效性亦恐會有所動搖。

91 川島真編，《中國の外交—自我認識と課題》（東京：山川出版社，2007年8月），頁28。

事實上，國府新獲得的國際地位與中國的實際國力並不相稱，由遣返在華日僑、日俘到派員前往淪陷區接收，甚至日本賠償物資的運送，無不依賴美國的支持與援助。儘管國府相當重視對日本的索賠問題，但是當美國的對日政策受到國共內戰與東亞地區冷戰的逐漸深化等因素的影響，由壓抑預防日本軍國主義再起，轉變成積極協助日本的經濟復興時，極度依賴美國支持的國府，其對日索賠之構想與期待便不免受到挫折。而隨著美國的東亞戰略政略的轉換，就國府而言，所謂的戰勝國，亦僅徒具表面上的意義了。直到1950年韓戰發生，美國對華政策轉變，撤退來臺的國府，方得以戰勝國的立場與日本簽訂和約。戰後中日關係與臺日關係的二元架構至此正式固定成形；惟實際上，此架構的輪廓於駐日代表團時期業已逐漸浮現。

（責任編輯：薛化元）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未刊布史料：

《外交部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070.4/0003，〈駐日代表團一般業務報告〉。

070.4/0006，〈駐日代表團人事〉。

《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檔案管理局閱覽：0000339323）

0035/172-1/1076，〈澀谷事件（1946-1947年）〉。

《國軍檔案》（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

062.43/7031.4，〈駐日代表團案〉。

《琉球政府文書》（沖繩公文書館藏）

0000079158，〈軍指令及一般文書1948年5-4〉。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002060100206026，〈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

002060100212009，〈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五月〉。

002060100220015，〈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一月〉。

002060100223019，〈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四月〉。

002060100227011，〈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八月〉。

002060100227020，〈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八月〉。

002060100250005，〈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八年三月〉。

002080103065008，〈特交檔案—中日戰爭〉。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4910/：067/10，〈臺灣人民在日本待遇問題〉。

編纂史料：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日本投降與我國對日態度及對俄交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66年10月。

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資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二）》。臺北：國史館，1998年6月。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三）、（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9月。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9月。

（二）年鑑、辭典、工具書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辭典編纂委員會編，《日本外交史辭典》。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年5月。

百瀨孝，《事典昭和戰後期の日本—占領と改革》。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年7月。

秦孝儀主編，《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年6月。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上、下冊。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張朋園、沈懷玉編，《國民政府職官年表》，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6月。

張憲文、方慶秋、黃美真主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

許雪姬編，《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5月。

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上、下冊。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12月。

（三）文集、日記、回憶錄

- 民國人物小傳編輯委員會編，〈民國人物小傳（301）—沈觀鼎〉，《傳記文學》，第77卷第1期（2000年7月），頁137-138。
- 石家孝，〈二次大戰後中國駐日代表團憶往〉，《傳記文學》，第65卷第5期（1994年11月），頁94-96。
- 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二三）〉，《傳記文學》，第27卷第1期（1975年7月），頁43-45。
- 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二四）〉，《傳記文學》，第27卷第3期（1975年9月），頁70-76。
- 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二五）〉，《傳記文學》，第27卷第4期（1975年10月），頁89-92。
- 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二七）〉，《傳記文學》，第27卷第6期（1975年12月），頁77-82。
- 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二九）〉，《傳記文學》，第28卷第3期（1976年3月），頁107-112。
- 沈觀鼎，〈對日往事追憶（三四）〉，《傳記文學》，第29卷第6期（1976年12月），頁117-122。
- 林歲德，〈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下の臺灣に生きて（中）—戰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と在日華僑の苦難〉，《日中》，第4卷第1號（1973年12月），頁53-64。
- 高玉樹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年7月。
- 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1月。
-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2005年7月。
- 鍾漢波，《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6月。
- 鍾漢波，《海峽動盪的年代：一位海軍軍官服勤筆記》。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1月。

張羣，《我與日本七十年》。臺北：中日關係研究會，1980年4月。

（四）期刊、報紙、公報

《總統府公報》，第247號，1950年2月28日。

《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5期，臺北，1998年12月。

《別冊歷史讀本》，第133號，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0年11月。

《別冊歷史讀本》，第414號，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7年7月。

（五）專書

川島真編，《中國の外交—自我認識と課題》。東京：山川出版社，2007年8月。

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國際關係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年6月。

川島真、松田康博編，《日臺關係：1945-2005》。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近刊預定。

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編，《在日辦理賠償歸還工作綜述》。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2月，1949年9月，初版復刻。

太平洋戰爭研究會，《大日本帝國海軍全艦艇》。東京：世界文化社，2008年8月。

外交部檔案資訊處編，《外交部駐外使領館沿革一覽表》。臺北：外交部，1980年2月。

江藤淳主編、波多野澄雄解題，《占領史錄》，第2卷。東京：講談社，1982年1月。

何義麟，《二・二八事件—「臺灣人」形成のエスノポリティクス》。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3年3月。

松本邦 解說・譯，《GHQ日本占領史第16卷外國人の取り扱い》。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6年12月。

袖井林二郎編，《世界史のなかの日本占領》。東京：日本評論社，1985年4月。

- 殷燕軍，《中日戰爭賠償問題》。東京：御茶水書房，1996年10月。
- 袁克勤，《アメリカと日華講和》。東京：柏書房，2001年3月。
- 最高裁判所事務總局涉外課，《涉外資料第7號 臺灣人に關する法權問題》。東京：同課，1950年5月，內部資料。
- 曹劍浪，《國民黨軍簡史》，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1月。
- 鈴木九萬監修，《日本外交史・第26卷：終戰から講和まで》。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3年9月。
- 奧田安宏、川島真ほか，《共同研究中國戰後補償－歷史・法・裁判》。東京：明石書店，2000年2月。
- 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年）》。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10月。
- 遲景德，《中國對日抗戰損失調查史述》。臺北：國史館，1987年3月。
- 謝南光，《敗戰後的日本真相》。臺北：民報印書館，1946年10月。
- 謝冰心著、倉石武四郎譯，《中國文學をどう鑑賞するか》。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9年9月。

（六）期刊論文

- 川島真，〈戰後臺灣外交の出發點－中華民國としての對日戰後處理外交〉，《北大法學論集》，第51卷第4號（北海道：北海道大學法學會，2000年11月），頁1490-1503。
- 川島真，〈日華外交史・日臺關係史研究動向－フォーラム參加の記錄〉，《公共政策を讀む》，第1集（北海道：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2006年3月），頁45-53。
- 山本真，〈中華民國史と臺灣史との接点をめぐって－大陸と臺灣での農地改革と土地行政〉，《アジア遊學》，48（東京：勉誠出版，2003年2月），頁118-224。
- 中村元哉，〈1940年代政治史からみた『自由中國』創刊の背景－『出版法』改正

- 議論をめぐって》，《現代臺灣研究》，29（吹田：臺灣史研究會，2005年12月），頁21-35。
- 石井明，〈中國の對日占領政策〉，《國際政治》，第85號（東京：日本國際政治學會，1987年5月），頁25-40。
- 李亞風，〈葉山會議風波之解構—關於1949年末國民黨政府駐日代表團內部政治衝突的分析〉，《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2期（2006年3月），頁104-107。
- 何義麟，〈評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新史學》，第11卷4期（臺北：新史學雜誌社，2002年12月），頁131-137。
- 何義麟，〈戰後臺灣における海外ニュースの報道と規制—澀谷事件の報道を中心に〉，《現代臺灣研究》，第32號（吹田：臺灣史研究會，2007年9月），頁3-19。
- 孟祥瀚，〈戰後運臺之日本賠償物資研究〉，《興大歷史學報》，第10期（臺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系，2000年6月），頁21-57。
- 林清芬，〈戰後初期我國留日學生之召回與甄審（1945-1951）〉，《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0期（臺北：國史館，2006年12月），頁97-128。
- 吳淑鳳，〈戰後中國對日求償之交涉（1945-1949）〉，《中華軍史學會會刊》，13（臺北：中華軍史學會，2008年9月），頁267-293。
- 荻野脩二，〈謝冰心の一面—したたかさ—〉，《中國文學會紀要》，27（大阪：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2006年3月），頁1-14。
- 陳孝惇，〈戰後日本賠償艦艇之接收編組及其意義〉，《中華軍史學會會刊》，6（臺北：中華軍史學會，2001年8月），頁173-213。
- 黃文德，〈中華民國對日派遣占領軍之問題—以駐日憲兵隊為討論中心〉，《憲兵半年刊》，第63期（臺北：憲兵學校，2006年9月），頁114-128。
- 黃自進，〈戰後臺灣主權爭議與《中日和平條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4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12月），頁59-104。

湯熙勇，〈公平對待與秩序維持之間：日本東京澀谷事件與臺灣人的審判（1946-47）〉，《亞太研究論壇》，第35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7年3月），頁1-35。

遲景德，〈從抗戰損失調查到日本戰敗賠償〉，《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6年9月），頁1319-1353。

遲景德，〈戰後中國向日本索取賠償研究〉，《抗戰建國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7月），頁498-547。

（七）口頭報告

張啟雄，〈占領期中華民國的對日政策（1945-52）〉，發表於早稻田大學「戰後の臺灣と日本學術研討會」（2007年10月29日）。

國史館館刊 第19期